

中国古代の貧困観と貧困救助制度

闫 浩

摘要：本文通过对中国古代各个时期政府对贫困的认识、贫困救助措施的梳理，发现中国古代各王朝对贫困的关注，以及开展贫困救助，不仅仅是基于统治的实际需要，更多是作为中国儒家传统政治道德的具体体现。通过对制度性贫困救助措施、临时性贫困救助措施两个维度的分类整理，在中国古代，制度性贫困救助和临时性贫困救助是一个整体的有机组成，长期来看，这种体系体现出一种由“临时性”向“制度性”逐步转化的过程。

关键词：贫困观；制度性贫困救助；临时性贫困救助

中国古代の貧困観と貧困救助制度

要旨：本文は中国古代の各王朝における政府の貧困に対する認識と、貧困を救済する措置などの整理を通じて、各王朝で貧困に対する注目および行われた救済は、統治するための実際的な需要だけではなく、より多くのは中国の儒家の伝統的な政治道德としての具体的な体现である。制度性貧困に対する救済または臨時性貧困に対する救済、2つの場面に分類し整理することによって、中国の古代に、制度性貧困の救済と臨時性貧困の救済は、有機的なつながりを持つ全体であることが分かった。長期的にみると、このシステムは「一時的」から「制度的」に徐々に転換する過程を体现する。

キーワード：貧困観；制度性貧困救助；臨時性貧困救済

The view of poverty and the system of poverty relief in ancient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through to the government of each period of ancient China, combin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poverty, poverty relief measures, found Chinese various ancient dynasty to focus on poverty, poverty relief and development, not only based the actual need of rule, but also embodied Chinese Confucian tradition and political morality; through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two dimensions of institutional poverty relief measures, temporary poverty relief measures in the consolidation, China ancient institutional poverty relief and temporary poverty relief is an integral, this system shows a "temporary" to "system" gradually transformed.

Keywords: view of poverty; institutional poverty relief; temporary poverty relief

贫困扶助、救济既是当代政府的职责所在，也是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回眸历史，我们发现，在中国漫长的社会进程中，贫困与贫困救助始终的历代统治阶层和社会精英们特别关注的社会现象，由此生发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贫困和贫困救助的道德要求。现代社会一般认为，贫困是一种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综合现象，其主要根源在于物质生活条件缺乏、精神生活没有或缺乏出路；也有观点认为贫困的真正含义是贫困人口创造收入能力和机会的贫困；贫困意味着贫困人口缺少获取和享有正常生活的能力。^[1]在中国古代，由于社会生产能力低下，国家财政供给有限，贫困主要是指个人、家庭依靠其劳动所得和其他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吃、穿、住、用等基本的生存需要。

一、中国古代的贫困观

中国很早就对贫困和贫困救助有明确的记载，古人一般将对贫困的关注和救助作为代表国家的天子及其大臣的责任。从先秦《周礼》的“荒政十二策”^[2]，到南宋的《救荒活民书》，再到清代的《荒政辑要》，中国古代在对贫困的认识和贫困救助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上古三代，基于生存需求的贫困是大多数先民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面临

的主要问题，作为早期统治者，认为百姓的国家的根本，对贫困者应当救济，即“养民”。“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3]“养民”是国家的重要职能之一，而国家对贫困的关注和救济是国家贫困政策的重要方面。

周朝人在描述祖甲继位时，指出“其在祖甲，不义惟王，旧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国三十有三年。”^[4]其认为祖甲得以在位三十多年的核心原因是“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周礼》专门记载了大司徒的职责包括“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缓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几，七曰眚礼，八曰杀哀，九曰蕃乐，十曰多婚，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盗贼”、“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其中，明确提出了“养老”“振穷”“恤贫”“宽疾”等问题。《礼记·月令》指出：“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发仓廩，赐贫穷，振乏绝，开府库，出币帛，周天下。”也就是说：作为德政的基础是普惠天下、救济贫困的百姓，政府要向他们提供粮、钱和衣服等生活必需品。

在春秋战国时期，各统治集团对贫困百姓的救济和扶助成为各政治集团争取百姓拥戴、富国强兵、称雄争霸的重要政策和举措，时人认为“振乏救穷，老弱疾病，孤子寡独”是“惟政所先。”^[5]晋悼公即位时，“辛巳，朝于武宫。定百事，立百官，育门子，选贤良，兴旧族，出滞赏，毕故刑，赦囚系，宥间罪，荐积德，逮鰥寡，振废淹，养老幼，恤孤疾，年过七十，公亲见之，称曰王父，敢不承。”^[6]吴越战后，勾践也说：“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与大国执雠，以暴露百姓之骨于中原，此则寡人之罪也，寡人请更。”于是葬死者，问伤者，养生者，吊有忧，贺有喜，送往者，迎来者，去民之所恶，补民之不足。然后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于吴，其身亲为夫差前马。”^[7]由此可以看出，勾践的“葬死者，问伤者，养生者，吊有忧，贺有喜，送往者，迎来者，去民之所恶，补民之不足”是其争取地方百姓支持和与民休息的重要举措。在《国语·吴语》记载中，当他准备向吴国复仇时，他“疾者吾问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长其孤，问其病”将其对老百姓中

的贫困群体和贫弱阶层的救助与关注作为其向外征战和获取人民支持的合法性来源及重要措施。

春秋时期最重要的文献之一——《管子》曾专文记载统治阶层对百姓贫困和扶贫救济的相关政策。“入国四旬，五行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疾，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所谓老老者，凡国、都皆有掌老，年七十已上，一子无征，三月有馈肉；八十已上，二子无征，月有馈肉；九十已上，尽家无征，日有酒肉。死，上共棺槨。劝子弟：精膳食，问所欲，求所嗜。此之谓老老。所谓慈幼者，凡国、都皆有掌幼，士民有子，子有幼弱不胜养为累者，有三幼者无妇征，四幼者尽家无征，五幼又予之葆，受二人之食，能事而后止。此之谓慈幼。所谓恤孤者，凡国、都皆有掌孤，士人死，子孤幼，无父母所养，不能自生者，属之其乡党、知识、故人。养一孤者一子无征，养二孤者二子无征，养三孤者尽家无征。掌孤数行问之，必知其食饮饥寒身之腴胜而哀怜之。此之谓恤孤。所谓养疾者，凡国、都皆有掌养疾，聋、盲、喑、哑、跛辟、偏枯、握递，不耐自生者，上收而养之疾官，而衣食之，殊身而后止。此之谓养疾。所谓合独者，凡国、都皆有掌媒，丈夫无妻曰鰥，妇人无夫曰寡，取鰥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后事之。此之谓合独。所谓问疾者，凡国、都皆有掌病，士人有病者，掌病以上令问之。九十以上，日一问；八十以上，二日一问；七十以上，三日一问；众庶五日一问。疾甚者，以告上，身问之。掌病行于国中，以问病为事。此之谓问病。所谓通穷者，凡国、都皆有通穷，若有穷夫妇无居处，穷宾客绝粮食，居其乡党以闻者有赏，不以闻者有罚，此之谓通穷。”^[8]其主张将贫困对象列为国家应该重点提供日常救济待遇的人群，即日常救助应当覆盖社会上老、幼、孤、疾、鰥、寡、病、穷、困、绝等十种主要救助对象和弱势群体。

孟子是中国古代主张“仁政”“德政”的大思想家，他在对齐宣王讲解“王政”时指出“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老而无妻曰鰥。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9]

汉光武帝建武六年(公元30年),光武帝曾命“郡国有谷者,给禀高年、鰥、寡、孤、独及笃癯、无家属贫不能自存者,如《律》。”^[10]《汉律》具体如何规定“廩食”这些人,因文献缺失,今天已不可考证,但可以确定的是,可以享受“廩食”待遇者包括“高年、鰥、寡、孤、独及笃癯、无家属贫不能自存者”^[11]。三国时期,魏文帝黄初三年(公元222年)“九月甲午,诏曰‘夫妇人与政,乱之本也。自今以后,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以此诏传后世,若有背违,天下共诛之’庚子,立皇后郭氏。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鰥寡笃癯及贫不能自存者赐谷。”^[12]即便在战乱时期,曹魏政权也提出“鰥寡笃癯及贫不能自存者赐谷”的政策,针对生存贫困的救济措施和扶助措施。

唐朝史籍记载“贞元二年(公元786年),帝以大盗后关辅百姓贫,田多荒废,诏诸道上耕牛,委京兆府劝课。量地给牛,不满五十亩不给。(袁)高以为‘圣。心所忧,乃在穷乏。今田不及五十亩即是穷人,请两户共给一牛’,从之。”^[13]由此看出,当时“田不及五十亩即是穷人”,将田地作为判别贫困和弱势群体的主要依据。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四月乙未,“赐民八十以上物,惇独鰥寡疾病不能自存者米二斛。”^[14]另据记载,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十二月,“甲午,内出绢二百匹,赈两市癯残穷者”^[15],将残疾人视为特殊救济对象,给予特殊的政策关照和救助。

在两宋时期,“穷民”“贫民”和弱势群体分别代表三类贫困人口。具体而言,一是生活极度贫困的赤贫者,被称作“穷民”,《周礼》曰“鰥寡孤独,天民之穷者”,穷民主要是那些失去劳动能力或不具备劳动能力,难以维持生存者,主要是鰥寡孤独、无依靠者、残废疾病难以为生者,这群人是贫困人口中的赤贫阶层。绍兴十三年(公元1143年)九月,高宗对大臣们说:“诸处有癯老废疾之人,依临安例,令官司养济。穷民无告,王政之所先也。”^[16]。第二类贫困阶层被称作“贫民”,宋朝有相当多的人口在平时生活比较困难,可勉强维持生存,一旦遇到天灾人祸、灾荒来临或赋税沉重,不少人便会陷入生存危机,这些人就是所谓的“贫民”。宋太宗(公元976—997年在位)时,规定乡村五等户中占田20亩以下的人户称为“贫民”。神宗(公元1067—

1085年在位)时,规定第五等户或产业在50贯以下的贫困户免出役钱。此外,宋代还有第三类贫困人口,即社会弱势群体,主要指那些由于某些障碍及缺乏经济、政治和社会机会而在社会上处在不利地位的人群。在宋朝,社会弱势群体主要包括老人、妇女和儿童。在传统社会中,老人、妇女和儿童由于年龄、性别、社会地位等自然和社会原因,在社会竞争中无疑处于不利地位,在资源占有与财富分配方面处于绝对劣势。宋朝也不例外。在平时,老人由于劳动能力的丧失,往往成为家庭的负担,从而沦为社会救济的对象,妇女地位低下,在婚姻中处于弱势地位;儿童也是如此,由于贫困,许多家庭不得不采取杀婴、弃婴的办法来维持现有人口的基本生存。

同一时期的辽国,也比较关注贫困问题。如保宁八年(公元976年)春,“三月辛未,遣五使廉问四方鳏寡孤独及贫乏失职者,振之。”^[17]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时期,辽国朝廷更加关注无职业者,其成为日常贫困救济的主要对象之一。

元代基本延续之前的扶贫规定,但其制度设计更加完善,官方对贫困群体有着相应的救助体系,其主要包括赈恤制度、收养制度、刑律优免制度、医疗救助制度等。元世祖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春正月,“壬辰,敕‘诸路鳏寡孤独疾病不能自存者,官给庐舍、薪米。’”^[18]。根据敕令,元朝救济的对象主要是“老幼残疾孤贫不能自存之人”;其次,在元王朝的救助体系中,设立有专门的官方收养机构,对失去生存能力而又无人收养的鳏寡孤独废疾者给予救助。刘秉忠曾上书“鳏寡孤独废疾者,宜设孤老院,给衣粮以为养”^[19]。忽必烈采纳了他的建议,下诏赈济天下鳏寡孤独废疾者。此后,元朝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对这些困难群体的收养救助制度,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在各路设济众院一所,至元十九年各路立养济院一所,还规定了收养的标准和操作过程。^[20]再次,元代专门设立了救助收养鳏寡孤独废疾等弱势群体的官方机构为“养济院(又称孤老院、济众院)”。养济院的处所为官房,没有官房的由官方营建,同时制定了收养鳏寡孤独的制度。按照元代法律规定“诸父母在,分财异居,父母困乏,不共子职,及同宗有服之亲,鳏寡孤独,老弱残疾,不能自存,寄食养济院,不行收养者,重议其罪。

亲疾亦贫不能给者，许养济院收录。”“诸鰥寡孤独，老弱残疾，穷而无告者，于养济院收养。应收养而不收养，不应收养而收养者，罪其守宰，按治官常纠察之……诸年谷不熟，人民转徙，所至既经赈济，复聚党持杖，剽劫财物，殴伤平民者，除孤老残疾不能自贍，任便居住，有司依前存养。”^[21]即国家不仅在救济措施中规定救济对象，还在颁布的救济制度明确救济对象，在法律文件中确定救济机构的收养对象。同时，被收养者可以定期得到一定数量的粮食、柴薪、衣服等生活物品，享受到官方免费提供的医疗保障，死后官方负责安葬，皇帝还不定期地给予他们特殊的物质赏赐。用于贍养的粮食为粟，从官仓内支取，依人数按月发放，有时蒙皇帝恩典，会赐予米。每人每天发放柴五斤，从本地年销柴（每年所供应之柴薪）中支取。有疾病的，由官医负责调养治疗，药物取自惠民药局。冬衣开始为每人土麻布二匹，后来改为保暖性较强的木棉布二匹，夏衣支給土麻布，有时皇帝会每人赏赐布、帛和绢。被收养人病故，由官方负责安葬，坟地指定在城乡周围空闲的官地内分派，棺材由官方提供，并派人运送安葬，所有费用取自朝廷收集的“贓罚钱”^[22]。在元代，贫困救济中还出现了新的救济对象。其一，元朝的贫困“站户”被专门列为救济对象。“站户”是专门为过路出使、进京、返程等政府官员和军队提供住宿饮食和交通工具（主要是马匹）的民户。从世祖时就开始关注“站户”的贫困问题，不断向他们提供钱粮救济。如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十二月“癸卯，发粟赈水达达四十九站。”二十八年三月“辛酉，吕连站木赤五十户饥，赈三月粮。”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十一月“大都、上都、兴和等十三驿饥，赈钞八千五百锭。”其二，由于工商业的长足发展，从事手工业劳动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增加，国家的关注对象已经从以前的“纯农业”劳动者向多行业劳动者转移，在元朝出现了将贫困的手工业者作为救济对象的史料，如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二月“赈欠州人匠贫乏者米五千九百九十九石。”这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此外，由于蒙古恶劣的自然环境，牧民中蒙古子女被贩卖为奴婢的现象十分突出。延祐年间，“朔漠大风雪，羊马驼畜尽死，人民流散，以子女鬻人为奴婢”。仁宗接受大臣拜住的建议，设立宗仁卫，由县官负责赎买和收养贫苦的蒙古子女。英宗时

下令“蒙古子女鬻为回回、汉人奴者，官收养之”，又在大都永平路设置营房，专门收养蒙古子女，“庚辰，置营于永平，收养蒙古子女，遣使谕四方，匿者罪之”^[23]。朝廷还经常向被收养的蒙古子女发放粮食、衣服、牲畜和金钱等。

明朝政府设立专门的扶贫机构，将贫困的救济纳入法律规定。政府设立养济院收留贫困百姓，设立漏泽园安葬民间无依无靠者，并且施行养老的政策，抚恤兵民百姓。——“初，太祖设养济院收无告者，月给粮。设漏泽园葬贫民。天下府州县立义冢。又行养老之政，民年八十以上赐爵。复下诏优恤遭难兵民。”^[24]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五月壬申，“上谕户部臣曰：‘比闻京城贫穷元依之人行乞于市，诚可悯恤。其令顺天府于大兴、宛平二县各设养济院一所收之。即今暂于順便寺观内京仓米煮饭，日给二餐，器皿、柴薪、蔬菜之属，从府县设法措办，有疾者，拨医调治，病故者，给以棺木，务使鰥、寡、孤、独得沾实惠。仍令五城兵马司从实取勘，当赈济者，即令送府，不得滥冒侵欺，违者，责有所归。’”^[25]明仁宗、明宣宗时期，政府救济对象和救济范围扩大到流民和弃婴，政府为流民提供食物和住宿，同时对弃婴进行收养和治疗；尤为难得的是，同期，将残疾人列为重要的救济对象，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四月壬寅，明孝宗“命顺天府赈恤都城内外民之鰥寡残废及贫难无依者，从户部奏也。”^[26]

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甲子，上御皇极门，颁诏天下，大赦。”并颁布昭令“丁银原有定额，年来生齿凋耗，版籍日削，孤贫老弱，尽苦追呼，有司查覈，老幼废疾，并与豁免。军民年七十以上者，许一丁侍养，免其徭役；八十以上者，给与绢醪米肉；有德行著闻者，给与冠带；鰥寡孤独、废疾不能自存者，官与给养。”^[27]同期也有文献记载“丁银原有定额，年来生齿凋耗，版籍日削。孤贫老幼，尽苦追徼，殊可悯恻。自今以后，各抚按官，严行有司，细加查核。凡幼未成丁、老残未豁者，悉与豁免。军民年七十以上者、许一丁侍养。免其杂泛差役。八十以上者、给与绢一疋、绵一斤、米一石、肉十斤。九十以上者倍之。有德行著闻，为乡里所敬服者，给冠带荣身。穷民鰥寡孤独废疾不能自存者，在京许两县申文户部，告给养济。在外听该府州县申详抚按，动支预备仓粮给养，务使人沾实惠。昭朝廷恤民至意。”^[28]

此外,《大清律例》将“收养孤老”形成专门“律例”制度^[29]:

【律】

89.00 收养孤老

凡鳏寡孤独及笃废之人,贫穷无亲属依倚不能自存,所在官司应收养而不收养者,杖六十,若应给衣粮而官吏克减者,以监守自盗论。[凡系监守者不分首从并赃论]

条例

89.01

直省州县所属养济院或应添造或应修盖者,令地方官酌量修造,据实估计,报明督抚,在于司库公用银内拨给,仍不时查勘,遇有渗漏之处,即行黏补完固,倘有升迁事故,造入交代册内,取具印结送部,其真实孤贫俱令居住院内,每名各给印烙年貌腰牌一面,该州县按季到院,亲身验明腰牌,逐名散给口粮,如至期印,官公务无暇遑委,诚实佐贰官代散,加结申报上司,毋许有冒滥扣克情弊,若州县官不实力奉行,该督抚即行查参照例议处。

89.02

军流等犯,除年逾六十不能食力者,照例拨入养济院,按名给与孤贫口粮外,或年未六十而已成笃疾,不能谋生者,亦一体拨给,其少壮军流各犯,实系贫穷又无手艺者,初到配所,按该犯本身及妻室子女,每名每日照孤贫给与口粮,自到配日起以一年为止,于各州县存贮仓谷项下,动用报销,各州县有驿递之处,一切应用人夫,酌派军流少壮中无资财手艺之犯充当,给与应得工食,无驿递之州县,公用夫役垆令一体充当,逐日给与工价,仍令该督抚照各处现行章程妥协办理。

89.03

老人九十以上者,地方官不时存问其或孤寡及子孙贫不能养赡者,州县查明赈恤,详报督抚奏闻动用钱粮,务令得沾实惠。

89.04

京师五城,各设栖流所一处,安顿贫病流民,其修理房屋工料及衣食药饵之资,每年每城动支户部库银二百两备用,如有不敷,许其赴部具领,如

或有余留，于下年备用，该城御史督率司坊等官实心办理，如有虚冒侵蚀等弊，照例交部治罪。

89.05

各省流寓孤贫如籍隶邻邑仍照例移送收养外，其在原籍千里以外者，准其动支公项银两，一体收养年底造册报销。

89.06

凡被灾最重地方饥民，外出求食各督抚善为安辑，俟本地灾侵平复，然后送回。

通过以上我们对中国历史贫困及贫困救助认识的梳理，每一朝代也在各自财政能力许可的范围内，开展多种形式的贫困救助，在这些贫困救助的历史案例中，我们依据救助机构设立与救助规定的形式，大致将其分为制度性贫困救助和临时性贫困救助两种类型，下面我们分别进一步探讨。

二、制度性贫困救济

制度性贫困救济，是将贫困救助的政策制度化、长期化。这种救济方式具有两个典型的特点，一是具有专门的救助机构（或官员负责），二是有专门的贫困救助措施和具体可操作的规定。

如前所述，在《周礼》、《管子》等早期文献中，我们都能够找到制度性贫困救济的内容。如《周礼》提出的保息万民的六项救助措施中五项是贫困救济的内容，并且设置了管理日常社会救济的官吏——大司徒；从《管子》一书中，可以看出，当时既设计了日常贫困救济的制度，又明确设置贫困救济的管理机构，由于年代久远，我们无法看到这些史料的具体记载，以及救助机构和官吏的具体措施。《晏子春秋》卷五“景公游于寿宫，睹长年负薪者，而有饥色。公悲之，喟然叹曰：‘令吏养之！’晏子曰：‘臣闻之，乐贤而哀不肖，守国之本也。君爱老而恩无所不逮治国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圣王见贤以乐贤，见不肖以哀不肖。今请求老弱之不养，鳏寡之无室者，论而共秩焉。’公曰：‘诺’，于是老弱有养，鳏寡有室。”^[30]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由朝廷主办的慈善救济机构“六疾馆”和“孤

独园”，收养穷人和孤幼之人。史载“太子与竟陵王子良俱好释氏，立六疾馆以养穷民。”^[31]又有“辛巳，舆驾亲祠南郊。诏曰：『春司御气，虔恭报祀，陶匏克诚，苍璧礼备，思随干覆，布兹亨育。凡民有单老孤稚不能自存，主者郡县咸加收养，贍给衣食，每令周足，以终其身。又于京师置孤独园，孤幼有归，华发不匮。若终年命，厚加料理。尤穷之家，勿收租赋。』戊子，大赦天下。”^[32]当时具体如何收养贫苦孤幼、如何救济贫困，因缺乏史料无法进行全面了解。

唐王朝在法律上规定了对贫困人口의 赋役救济政策，其史料主要来源是《旧唐书》、《新唐书》的“食货志”。“武德七年，始定律令。以度田之制：五尺为步，步二百四十为亩，亩百为顷。丁男、中男给一顷，笃疾废疾给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若为户者加二十亩”^[33]又“老及笃疾、废疾者，人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当户者增二十亩。”“若老及男废疾、笃疾、寡妻妾、部曲、客女、奴婢及视九品以上官，不课。”^[34]从这些史料，我们可以看出唐代对笃疾废疾等贫困人口의 救助制度已经纳入制度，这使得这一范围的贫困者能够享受到这一贫困救助措施。

宋朝的贫困救助制度主要是“居养法”和“惠养乞丐法”，其将救助范围从鳏寡孤独等有固定居所的贫困人口，扩展到乞丐。宋朝初年，在京师设立收养贫困人口의 福田院，其他诸路设广惠仓。宋神宗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朝廷颁发了“惠养乞丐法”，即从元丰年间（公元1078～1085年）开始实施的“惠养乞丐法”^[35]，该法规定，每年十月入冬之后，天下各州政府必须“差官检视内外老病贫乏不能自存者（包括流浪乞丐）”，将他们一一登记在册，每人一日“给米豆一升，小儿半之”，每三天发放一次，从本年十一月初一开始发放，至来年三月的最后一天停止。哲宗元符元年（公元1098年）又发布“居养法”，各地方政府广设居养院（南宋时多称养济院）、安济坊，使政府对贫困人群的救济在全国普遍展开。“鳏寡孤独贫乏不能自存者，以官屋居之，月给米豆，疾病者仍给医药。”居养院起初只是收养“鳏寡孤独贫乏”者，到了徽宗朝，由于“在京遇冬寒，有乞丐人无衣赤露，往往倒于街衢”，而“居养院止居鳏寡孤独不能自存之人”，惠不及流浪乞丐，所以宋徽宗于

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闰十月下诏：“遇冬寒雨雪，有无衣服赤露人，并收入居养院，并依居养法。”^[36]南宋时，广设养济院，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正月，高宗下诏要求临安府的养济院“将街市冻饿乞丐之人尽行依法收养”。宋朝对乞丐的收养，采取冬季集中、待春暖以后则遣散的收养政策。对于集中性收养的人群，国家提供衣食和取暖柴薪。集中收养时间一般始于当年十一月一日，到第二年二月底遣散。但由于每年二月新谷尚未上市，放散的乞丐很难乞食，国家又往往根据情况调整放散时间。如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三月二十六日，“中书门下省言：‘临安府赈养乞丐人，三月一日已行放散，各无归所。’诏临安府更赈养一月，候麦熟取旨罢；闰四月三日，临安府言：‘被旨乞丐人更赈养一月，合至四月二十九日满。’诏更展一月”^[37]。即将放散时间调整到五月底。甚至也曾将放散时间延迟到七月底。此外，宋朝对城市贫民的救济还包括提供一定的住房补贴，“国朝祖宗以来，惠恤孤贫，仁政非一，每遇大雨雪则放公私房钱。”

元代沿袭前朝制度，但更加体系化。从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在各路建立养济院，对贫困人口进行制度性救济。其赈恤共有6种制度^[38]，其中涉及贫困救助的制度性政策有两种——“救荒之政，莫大于赈恤。元赈恤之名有二：曰蠲免者，免其差税，即《周官·大司徒》所谓薄征者也；曰赈贷者，给以米粟，即《周官·大司徒》所谓散利者也。”“鰥寡孤独赈贷之制：世祖中统元年，首诏天下，鰥寡孤独废疾不能自存之人，天民之无告者也，命所在官司，以粮贍之。至元元年，又诏病者给药，贫者给粮。八年，令各路设济众院以居处之，于粮之外，复给以薪。十年，以官吏破除入己，凡粮薪并敕于公厅给散。”^[39]

明朝的贫困救助主要是对老年人的救助和政府养济院。“初，太祖设养济院收无告者，月给粮。设漏泽园葬贫民。……复下诏优恤遭难兵民。然惩元末豪强侮贫弱，立法多右贫抑富。”^[40]由于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寒，亲身经历了民间疾苦有关，导致明朝政策更注重“均贫富”，由于“立法多右贫抑富”，明朝社会基本没有叫化子和流浪汉，从洪武元年起即在全国每个县设有养济院免费收留，对贫困人群实施集中制度性救济，“收无告者，月给粮”，“每

名口月给太仓米三斗，岁给甲字库布一匹。”^[41]。宣德元年十一月戊戌，宣宗对顺天府尹王骥等曰：“自古仁政必先鰥寡孤独，朝廷设养济院意正如此，近闻京师皮有残疾饥寒无依之行乞，尔为亲民之官，保得漫不加省？其悉收入养济院，毋令失所。”^[42]明代，不仅养济院的日常支出由政府承担，而且对养济院内收养的人口，国家也常常有额外的救济措施，“即今暂于顺便寺观内京仓米煮饭，日给二餐，器皿、柴薪、蔬菜之属，从府县设法措办，有疾者，拨医调治，病故者，给以官木，务使鰥、寡、孤、独得沾实惠。”^[43]后又“设漏泽园葬贫民。天下府州县立义冢。”到弘治十五年之后，养济院和漏泽园的设置已经逐步推广到边远地区，遍及全国。无论是养济院，还是漏泽园都是明朝常设的贫困救济机构，各项开支有统一标准，由政府负担，并派专人进行管理。

相对而言，清朝是对贫困救助最完善的历史时期。首先，清朝对贫困人群救济的全国性常设机构有：养济院、漏泽园、留养局；在京师有五城粥厂、栖流所。顺治元年设置养济院之后，又于八年（公元1651年）八月，令各地依据明代养济院的做法进行管理，“诏各省府州卫所旧有养济院皆有额设米粮，该部通行设立给养，该道官府从实稽查，俾沾实惠”^[44]，在这一方面，延续明朝养济院制度，尽快使养济院的功能和作用得以发挥。清朝各代皇帝对养济院的建立和完善都很重视，不断督促地方政府对各地养济院进行修建和维护。漏泽园是清朝建立的公共墓地。清朝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始建，之后推广到全国各地。由政府划拨官有空闲地作为义冢，凡死后家人无力埋葬或者是无亲友故人埋葬者都可以由官府将其埋入义冢，政府助葬是对贫困人群救济的重要措施。其次，清朝政府为京城冬春季无处就食的贫民设立了京师粥厂，又称饭厂。清朝粥厂作为制度性的常设救助机构，其不仅在大批流民出现时提供救助、稳定社会，而且有固定时间、固定地点、并由专门机构人员管理。清朝最早的政府粥厂于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开设。后在京师五城各设饭厂一所，所以又称京师五城粥厂，一般每年从农历十月至次年三月，煮粥赈济饥民。第三，清朝在京师五城设栖流所，《大清律例》规定：“京师五城各设栖流所一处，安顿贫病流民。其修理房屋工料及衣食药饵之资，

每年每城动支户部库银二百两备用。如有不敷，许其赴部具领，如或有余，留于下年备用。该城御史督率司坊等官，实心办理，如有虚冒侵蚀等弊，照例交部治罪。”可见，栖流所为流落到京城的无家可归者提供维持生存的饮食、医药和居住救济待遇。每年政府拨经费，有专门人员进行管理，对进入栖流所的贫民“日给钱米有差；隆冬酌给棉被，所拥一人扶持之；病故者给棺以殓，标识其处，以待其家访寻者，其费由部关支。”京师以外的栖流所设置比较少，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政府曾经对云南的栖流所职能做出规定，为“收养路过贫病之人。”最后，在京师以外地区也有类似栖流所的救济机构，但在名称上有所不同，称为“留养局”。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政府命“直隸州设留养局收恤老弱贫民，其外来流移贫民例无给赈者，准一体入局留养。”留养局虽然是为救济流民设置的常规性救济机构，但并不是全年开放。其制度类似于宋代对乞丐的收养，一般为每年十月底开始收留贫民，至第二年二月止。留养局有固定的专用房屋，负责向流民提供维持生存的基本物品。

三、临时性贫困救助

作为制度性贫困救助的补充，临时性贫困救助一般是国家对百姓进行的有重大突发事故或偶然性因素而导致的贫困状况；这种救助形式一般没有常设机构、也没有制度性、长期性的保障。其一般采取诏、令形式予以确定，或由大臣提出，君主同意后颁行。

周襄王十六年（公元前636年），在外流亡了十九年的公子重耳（晋文公）回国即位，“元年春，公及夫人嬴氏至自王城。……公属百官，赋职任功，弃责薄敛，施舍分寡。救乏振滞，匡困资无。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懋穡劝分，省用足财，利器明德，以厚民性。”并最终“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政平民阜，财用不匮。”^[45]在这些措施中，“分寡、救乏、振滞、匡困资无”都是具体的贫困救助手段，晋文公以此“利明德”“厚民性”；《晏子春秋》是记载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齐国政治家晏婴言行的一部历史典籍，其内容大多为史料记载，该书多

处记载了晏颖规劝君主救济贫困的故事。如见饥寒者给予衣食的救济,“景公衣狐白裘不知天寒晏子谏第二十”中载“景公之时,雨雪三日而不霁。公被狐白之裘,坐堂侧陞。晏子入见,立有间,公曰:‘怪哉!雨雪日而天不寒。’晏子对曰:‘天不寒乎?’公笑。晏子曰:‘婴闻古之贤君饱而知人之饥,温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劳。今君不知也。’公曰:‘善!寡人闻命矣。’乃令出裘发粟,与饥寒。令所睹于涂者,无问其乡;所睹于里者,无问其家;循国计数,无言其名。士既事者兼月,疾者兼岁。”^[46]此外,该书也多处记载晏子规劝景公救助贫困的案例,如:景公出游时对贫困的救济、提议让官府收养孤儿、救济贫弱的案例等;成为早期国家临时性贫困救助的有力证明。

汉朝之后,这种临时性的贫困救助的案例更加频繁。永元五年(公元93年)三月,和帝“遣使者分行贫民,举实流冗,开仓赈粟三十余郡。”永元八年(公元96年)二月,“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三老、孝悌、力田三级,民无名数及流民欲占者一级;鰥、寡、孤、独、笃癯,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四月,“诏赈贷并州四郡贫民。”^[47]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刘宋孝武帝大明七年(公元463年),出巡南豫州、南兖州,颁布诏令:“可蠲历阳郡租输三年。遣使巡慰,问民疾苦,鰥寡、孤老、六疾不能自存者,厚赐粟帛。高年加以羊酒。”^[48]在《魏书》中太和年间(公元477~499年)就多次出现北魏孝文帝对贫困人群的救济史料,如太和三年(公元479年)十一月癸卯“赐京师贫穷、高年、疾患不能自存者衣服布帛各有差。”太和五年(公元481年)二月辛卯“赐孤贫不能自存者谷帛有差。”太和六年(公元482年)夏四月甲辰“赐畿内鰥寡孤独不能自存者粟帛有差。”八月癸未又“分遣大使,巡行天下遭水之处,丐民租赋,贫俭不能自存者,赐以粟帛。”太和七年(公元483年)夏四月庚子“幸崞山,赐所过鰥寡不能自存者衣服粟帛。”太和十三年(公元489年)夏四月丁丑诏曰:“升楼散物,以赉百姓,至使人马腾践,多有毁伤,今可断之,以本所费之物,赐穷老贫独者。”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八月壬寅“路见眇跛者,停驾亲问,赐衣食终身。”太和二十年(公元496年)七月丁亥诏曰:“疾苦六极,人神所矜,宜时访恤,以拯穷废。鰥寡困乏不能自存者,明加矜恤,令得存济。”

虽然出于救济的原因不同，但救济的对象都是贫困者，提供的他们急需的衣食等生活必需品。

隋炀帝时曾诏告天下，颁行若干临时性的贫困救助政策。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孝悌力田，给以优复。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量加振济。义夫节妇，旌表门闾。高年之老，加其版授，并依别条，赐以粟帛。笃疾之徒，给侍丁者，虽有侍养之名，曾无调贍之实，明加检校，使得存养。”^[49]

唐朝之后，农业生产力的大幅提升，促使朝廷财政有更多的富余用于贫困救助，这些措施大多被纳入具体的赋役制度中，使之长期化、制度化。但作为补充，临时性救济制度也常以诏、令等形式发布。太宗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正月乙巳，诏：“有八十已上，及孝子顺孙、义夫节妇、鳏寡孤独、有笃疾者，赐物各有差。”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二月，“庚申，赐所过高年、鳏寡粟。”^[50]元和七年（公元812年），“十一月辛酉，赦魏、博、贝、卫、澶、相六州，给复一年，赐高年、孤独、废疾粟帛”^[51]在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十二月，又有专门对城市贫民的救济措施：“甲午，内出绢二百匹，赈两市癯残穷者。”^[52]

与唐代一样，宋朝也建立起针对贫困救助的制度性专门机构，但其临时性贫困救济措施记载也更多。如仁宗年间（公元1023～1031年）“天禧元年，三月，辛酉，令作淖糜济，怀、卫流民。十二月，丙寅，京城雪寒，给贫民粥。”“景祐元年，正月，诏开封府界诸县，作糜以济饥民，诸灾伤州军亦如之。”“嘉祐四年，春正月，辛丑，遣官分行京城，赐孤穷老疾钱，几县委令佐为糜粥济饥”^[53]。元祐三年（公元1088年）冬，“频雪，民苦寒，多有冻死者”。吕公著为相，“出内库钱十万缗，委开封府官吏走遍闾阎周视而赈之”^[54]。同时，国家也常常使用集中置场赈济的方式对贫民进行救济。政府将赈济物品集中于一处或数处，令受济者持证前来领取。如嘉定十二年（公元1219年）十二月九日，“都省言：‘岁晚严寒，细民不易，合议优恤。’诏令丰储仓所于桩管米内支拨二万石赴临安府，日下分头差官疾速抄札的实贫乏人户，即遍置场赈济五日，务要实惠及民，毋得迟延，容令吏胥作弊。候赈济毕日，开具帐状供申”^[55]。置场赈济降低官吏的工作强度，提高了赈济效率。同

期，另一种贫困救济方式——赈粟救济也采用置场形式。赈粟即售米赈救，是国家通过平抑粮价达到救助灾民的方法，在救济资金有限的情况下，赈粟比赈济覆盖范围更广，且弊端更少，效率也更高。如元祐三年（公元1088年）正月十二日，大雪使粮价飞涨，“诏发京西南路阙额禁军粮谷五十余万石斛，减市价出粟至夏麦熟日止。”^[56]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七月，“诏今后所在置场粟米更不限时月，如遇在京斛斗价高，户部取旨出粟”。贫困人群除需要国家为其提供口粮，保证基本生存条件外，对于一般贫民来说，御寒的柴薪也同样重要。为此，国家也采取了相应的救济措施，如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十二月六日“帝谓宰臣王旦等曰：‘民间乏炭，其价甚贵，每称可及二百文。虽开封府不住条约，其如贩夫求利，唯务增长。宜令三司出炭四十万，减半价鬻与贫民，如此非惟抑其高价，实且济得人民。’”并且“将来令三司别擘画炭五十七万，如常平仓斛斗封桩，遇炭贵，减价货之，即京帅炭价常贱矣。”^[57]

金朝“承安二年，冬十月，甲午，大雪。以米千石赐普济院，令为粥以食贫民。”^[58]重熙十五年（公元1046年）十一月“乙巳振南京贫民。”大安二年（公元1076年）九月“壬申，发粟振上京、中京贫民。”^[59]

元代从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各路建立养济院，对贫困人群进行制度性救济。由于养济院收养的人数的限制，制度性的贫困救济措施难以覆盖，临时性的贫困救助措施就成为必要的补充。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冬十月戊申“给水达达鰥寡孤独者绢千匹，钞三百锭。”“给京师南城孤老衣粮房舍。”^[60]大德五年（公元1301年）规定对京师内的“老幼单弱不能自存者，廩给五月。”^[61]即对某些地区的贫困人群、在某一时间内进行救济。

明朝惠帝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二月，诏：“赐民高年米肉絮帛，鰥寡孤独废疾官为牧养。”^[62]天顺二年九月丙午，英宗诏令：“出内帑绵布一百匹，给大兴、宛平县养济院贫民。”^[63]明朝类似救济诏令较多，虽不能保证贫困百姓永远生活无忧，但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民间贫困。

四、结论

贫困现象与人类社会历史相伴生，中国古代在长期的农耕文明中积累了丰富的贫困救助的经验，历朝历代进行了众多贫困救助的尝试，在对贫困的认定方面，一般通过对个人身份、财产状况、家庭劳动力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以此进行分类定级。如清代汪志伊在《荒政辑要》中将“产微力薄，家无担石，或户倾业废，孤寡老弱，鹄面鸠形，朝不谋夕者”定为极贫，将“田虽被灾，盖藏未尽，或有微业可营，尚非急不及待者”定为次贫。对不同程度的贫困者给予不同的救济扶助，如明代林希元《荒政丛言》提出“极贫之民便赈米，次贫之民便赈钱，稍贫之民便转贷”。在扶贫方式上，坚持政府主导，注重制度性、长效性扶贫救助和临时性、短期性扶贫救助相结合；汉代以前，贫困人口一般以政府临时性、短期性贫困救助为主，汉代之后，国家将贫困纳入法律，在中央和地方设立专门贫困救助机构，形成制度性、长效性的贫困救助体系，国家有义务向“贫不能自存者”提供救助。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有多种贫困救助方式，不仅覆盖衣食住行，而且在明清时期更出现了福利性质的养老救助；同时，国家贫困救助方式多元，如两宋时期官办常平仓、义仓、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等常设救助方式与赈济、赈贷与赈粥等临时救荒手段并用；明清时期招商赈济、以工代赈等方式也被运用于贫困救助中，这大大提升了贫困救助效率。

中国自古提倡仁义，特别注重对鳏寡孤独、残疾者的救济、收养，对贫困、突遭不幸变故者的救助，主要采取给贫病者施药、施粥、收养弃儿丐童及设义冢收埋枯骨、饥殍，施送棺槨等善举，而制度性救助和临时性救助措施共同构成了古代中国的贫困救助体系。据管子记载，商汤吸取了夏桀“失其天下”的教训，实行了“夷疏而积粟，饥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资者振之”的政策，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戴。战国时期的诸侯并起，称雄争霸，各国为了安定社会、收揽人心，也部分地实施了社会救助政策。如齐桓公时期采用的“振孤寡，收贫病”（《管子·轻重甲》）政策；秦汉时期有了专门的救助机构。汉朝还为穷人设立了专门的收容机关。“受粥法”中规定，民年90以上者，

不但自己生活有保障,就连他的子、孙、妻、妾也可以得到政府的食物救济,不致使其挨饿;唐宋时期,社会救助制度发展的更加完善,这一时期慈善机构更加多样化,救助内容更加广泛。唐玄宗在位时设置收容、救助贫病孤疾者的专门机构。元明清时期对“老弱群体”实施救济的措施得以完备,元明两代是以养济院为主,另外还设安乐堂、栖流所、惠民药局等救助机构。清朝顺治五年,即诏告各处设立养济院,收养鳏寡孤独及残疾无告之人,由于朝廷重视,各府州县几乎都设立的养济院,长时间来看,中国的贫困救助经历了由临时性贫困救助向制度性贫困救助的缓慢的发展历程,但不容否认的是,临时性贫困救助始终是制度性贫困救助最有力的贫困保障。

总之,在我国漫长的古代社会,历朝历代在针对贫困的认识、贫困救助的理念、措施各有不同,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将贫困作为其政治统治的核心关注之一,本文想要指出,朝廷和百姓、官与民之间,不仅仅存在对立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也存在互相关照、互相促进的“互惠”关系或“互助”结构;虽然贫困与贫困救助政策在救助对象、救助内容和救助标准方面虽略有不同,但每个朝代的政权都不会忽视社会最底层百姓的生存权,这不仅仅是统治的需要,更是基于同类视角、植根于整个国家政治中的人性关怀和道德要求。

参考文献:

- [1] 阿马蒂亚·森. 贫困与饥荒 [M]. 商务印书馆, 2001.
- [2] 《周礼·地官·大司徒》
- [3] (周)《尚书·大禹谟》
- [4] 顾颉刚. 尚书校释译论 [M]. 中华书局, 2005.
- [5] 黄怀信, 张懋镠, 田旭东. 逸周书汇校集注 [M].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 [6] (春秋)《国语·晋语》
- [7] (春秋)《国语·越语》
- [8] (春秋)《管子·入国》
- [9] (战国)《孟子·梁惠王下》
- [10] 吕思勉. 吕思勉读史札记 [M]. 1982.
- [11] 甄尽忠. 两汉社会救助思想 [J]. 南都学坛: 人文社会科学学报, 2005, 25(4): 1-6.
- [12] (晋) 陈寿. 《三国志·卷二·魏书二·文帝纪第二》

- [13] (北宋) 宋祁、欧阳修、范镇、吕夏卿.《新唐书》卷一二〇《袁恕己传附孙高传》
- [14] (北宋) 宋祁、欧阳修、范镇、吕夏卿.《新唐书·太宗纪》
- [15] (后晋) 赵莹等.《旧唐书》卷十六《穆宗纪》
- [16] (宋) 熊克.《中兴小纪》卷三十一
- [17] (元) 脱脱等.《辽史·第八卷·本纪第八》.
- [18] (明) 宋濂、王祿.《元史·本纪第七·世祖四》.
- [19] (明) 宋濂、王祿.《元史·卷一百五十七·列传第四十四》.
- [20] 佚名.元朝的收养救助制度.《人民政协报》2010年8月3日第12版.
- [21] (明) 宋濂、王祿.《元史·刑法志·二·户婚》.
- [22] 佚名.元朝的收养救助制度.《人民政协报》2010年8月3日第12版.
- [23] (明) 宋濂、王祿.《元史·卷二十八·本纪第二十八》
- [24] (清) 张廷玉.《明史·食货一》
- [25] (明)《明英宗实录》明英宗睿皇帝实录卷二百七十八.
- [26] (明)《明孝宗实录》明孝宗敬皇帝实录卷一百八十六
- [27] (民国) 赵尔巽主编.《清史稿·世祖本纪一》
- [28] (清)《清实录顺治朝实录》
- [29] (清)《大清律例》
- [30] (春秋) 晏婴.《晏子春秋》内篇杂(上)
- [31] (梁) 萧子显.《南齐书·文惠太子传》
- [32] (唐) 姚察、姚思廉.《梁书·武帝纪下》
- [33] (后晋) 赵莹等.《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上》
- [34] (北宋) 宋祁、欧阳修、范镇、吕夏卿.《新唐书·卷五十一·食货一》
- [35] (清) 毕沅.《续资治通鉴·宋纪七十二》“丁酉, 诏: 诸州岁以十月差官检视内外老病贫乏不能自存者, 注籍, 人日给米豆各一升, 小儿半之, 三日一给。自十一月朔始, 止明年三月晦。”
- [36] (清) 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六》
- [37] (清) 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六》
- [38] (明) 宋濂、王祿.《元史·志第四十五上·食货四》六种制度为“恩免之制”“灾免之制”“鰥寡孤独赈贷之制”“水旱疫病赈贷之制”“京师赈巢之制”“入粟补官之制”;
- [39] (明) 宋濂、王祿.《元史·志第四十五·食货四》
- [40] (清) 张廷玉.《明史·志第五十三·食货一》
- [41] (明) 沈榜.《宛署杂记》
- [42] (明)《大明宣宗章皇帝实录》
- [43] (明)《明英宗睿皇帝实录》
- [44] (清)《清通典》卷17《食货·赈恤》
- [45] (春秋)《国语·晋语四》
- [46] (春秋)《晏子春秋》“内篇谏上第一”

- [47] (南朝宋) 范曄等.《后汉书·本纪·孝和孝殇帝纪》
- [48] (南朝梁) 沈约.《宋书·本纪第六·孝武帝》
- [49] (唐) 李延寿.《北史》卷十二隋本纪下第十二
- [50] (北宋) 宋祁.欧阳修.范镇.吕夏卿.《新唐书·唐太宗李世民传》
- [51] (北宋) 宋祁.欧阳修.范镇.吕夏卿.《新唐书·唐宪宗李纯传》
- [52] (后晋) 赵莹等.《旧唐书·卷十六·穆宗纪》
- [53] (元) 脱脱.阿鲁图等.《宋史·本纪·卷十》
- [54] (宋) 董煟.《救荒活民书·卷下》
- [55] (清) 徐松.《宋会要辑稿》
- [56] (清) 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七
- [57] (清) 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七
- [58] (元) 脱脱.《金史·章宗本纪》
- [59] (元) 脱脱等.《辽史·本纪·卷二十四》
- [60] (明) 宋濂.王祿.《元史·本纪·卷十二》
- [61] (清) 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四》
- [62] (清) 张廷玉.《明史·恭闵帝纪》
- [63] (明)《明英宗睿皇帝实录卷》

